本版编辑：曹颖新
E-mail：m6@studytimes.cn
Tel：010—62806236

有所思

弗敬不正 从容中道 自胜者强

——从“因缘”说起

□ 张 辛

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、精粹的、经典的、学术的部分，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教养的结晶。其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三个字：道、礼、和。道者，内在根据；礼者，外在准则；和者，理想状态或最终目的。率性（遵循天性、天道）行之谓之道，各行其道谓之礼，各得其所谓之和。道、礼、和三字包罗万事万象，大到宇宙天体，中到人类社会，小到人类个体生命以至于每一个人的具体行为概莫能外。三字互为因果，相辅相成，构成一个有机的知行合一的理论体系，一个基本由儒道释三家共同创造的伟大理论体系。

国学的主要构成也是三个字：经、传、子。经者，文本、元典，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春秋》是也；传，解释、注释文本、元典者也，诸如《礼记》《左传》《公羊》《谷梁》之类；子，实践、落实文本或元典者，诸如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孝经》等。子以孔子为首，包括老子、庄子、孟子等先秦诸子，以至汉代董子之流，佛教最后参入。

佛教是以子，即释子的身份参与到中华经典理论大体系中来的，于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。缘文化即其中不可或缺而颇具特色的一部分。

佛教认为，世上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“因缘而生”，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，万事万象都处于因果关系之中，依一定条件生起、变化。这就是《法华经·方信品》所谓“佛种从缘起”。而一切事物或现象的生成变化既有其主要或直接原因，也有促成其生成变化的辅助原因或条件，前者即所谓“因”，后者即所谓“缘”。因缘是形成事物，引发认识，造就业报等现象所依赖的原因和条件。《涅槃经·师子吼菩萨品》曰：“因有二种，一者正因，二者缘因。成佛虽因佛性为正因，亦须有缘因。”缘者缘助，能开发正因之性者即缘因。故《翻译名义集·释十二支》引僧肇语曰：“前缘相生，因也；现相助成，缘也。”

因、缘二者互相联系，彼此依存，相辅相成，不可或缺。因，为本（种），为主，为正，固然重要，但缘是条件，是助力，同样不可或缺。道理很简单：佛家认为“一切众生皆有佛性”。佛性即因，是天然的，本生所有的。但正如种子没有土壤、水分以及阳光等不会发芽生长一样，有因而不得其缘是无生无成无果的。因此佛家在强调因的同时特别注重缘的价值，称“诸法从缘生，诸法从缘灭”，“随处任缘”。既然万事万物皆“因缘而生”，即依凭某种条件才得以存在，并随条件变化而变化，那么它就不具备质的规定和独立实体，即没有恒常自在的主体，故谓之“空”。因而只有条件的存在和变化才是绝对的，事物本身的存在与变化只是相对的。于是龙树《中论·观四谛品》说：“众因缘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亦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义。”强调中道是真正把握一切事物现象的实相的方法和途径。

因缘说在古代中国生长发育，并产生深刻影响。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我国特定的天然根基和生态基础，在于中国本体文化的特质和传统。中国文化是道文化，是人道、人本文化，重根，重本，重渊源，重祖宗，重传统。孔子后学告诉我们，“天地者，生之本，物之本；先祖者，类之本，人之本”。《老子》曰：“夫物芸芸，各复归其根。”有根才有枝叶，有源才有流，有传统才有现代。《庄子》曰：“彼出于是，是亦因彼。”

而“天下万物发于根，始于母，原于雌”（庞朴语），故无论儒道皆大力倡扬柔。柔是中华民族整体国民性格特点。“温柔敦厚诗教也”（《礼记》）；“柔能生刚，柔能克刚”；主张“以濡弱谦下为表，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”（《庄子》）。

于是道家表现出了非凡的人生大智慧：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；“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”。人类之最适中最理想的行为是“为而不争”。为，有所作为。有所作为才有文化成果，才有文化财富的创造，才有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保障。不争，才能减少文化成果的损失，实现文化积累。不争，才能避免伤害，甚而赢得尊重，赢得自己的发展时间和空间，才能走向强大以至高大、博大、悠久。中华文明之所以绵绵不绝，成为四大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，就在于知雄守雌，在于“柔克”“自胜”，中华民族不是“胜人”而是自胜的民族。

于是道家、儒家殊途而同归，视“和”为终极目的或理想归宿。和者，天人和谐，社会和谐，身心和谐也。然而“和”毕竟只是理想，争则是客观甚至永久的存在。如何实现理想状态，即和谐？或曰实现理想的途径或方式是什么？儒、道之答案各不相同。

道家偏向消极，主张“无为自化”，众所周知，不必赘言。在这里，儒家则彰显出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，张扬人类所独具的品性：教养，强调“中庸”，主张“从容中道”。从即忠，容即恕，故曾子曰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”。

中庸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。中者，适中之谓。“庸者，用也，常也”。用者，用中，以适中的方式做事；常者，常规，常态，常行。我们祖先以适中的方式做事成就了中国的文化传统，成就了中国人做人的规矩和行为准则、道德规范。中庸有两大标本：上天和祖先。于是中庸内涵和基本表现形态只是两个字：序与和。上天宇宙既是严整的秩序，更是圆满的和谐，序与和是上天宇宙运行的大准则。于是我们祖先“则天”，“率性”，“承天之道而理人之情”，以此准则来规划和安排中国社会，于是成就了“礼仪之邦”，成就了独树一帜的礼乐文化。故二程说：“礼只是一个序，乐只是一个和。一个序，一个和，二字含蓄多少义理。”

“礼者，人道之极（准则）也”（《荀子》）。礼是入道、行道的保障，即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。故孔子说：“不知礼无以立。”

“礼别异”。礼的指标是实现秩序，礼的起点或前提则是分。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分别、分理、分化的过程。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分化混沌，告别愚昧，战胜野蛮，然后步入文明，走向自觉。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三大分别、分理、分化的基础工程，即天人之分、人人之分和个体生命的身心之分之上。这三大基础工程决定了人类群体的三大主体行为：如何对待上天、如何对待他人、如何对待自己。这三大主体行为造就了人类的三大主体文化：物质文化、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。而天人、人人和个体身心这三大关系实即三大因缘，彼此依存，相辅相成。

“礼本于仁”。仁是实施三大主体行为，处理三大基本关系，并使之达到理想状态，即和谐的最高准则和最适中手段、最有效方式。于是成为“人之为人的最高标准”（冯友兰语）。“仁者爱人”，仁的基础内涵是爱，即所谓“亲亲之谓仁”。但爱并非仁的主要内涵，爱属自然，是天性，是本能，是感性的，有等差，有时限，讲占有，可拒绝。爱是上天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一种基本情感。

“仁”的主要内涵是敬，即孔子所谓“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”。敬是教养，是理性的，平等的、无时限，重分享，是互相的，并不可拒绝。故孔子曰：“无敬何以别（犬马）乎？”敬乃是处理天人、人人（包括民族与民族，国与国之关系）及身心三大关系的要津。

于是孔子曰：“礼主敬。”《易·坤卦》：“君子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。”《易·离卦》曰：“敬之无咎。”《左传》曰：“敬，礼之舆也。”《庄子》曰：“敬中以达彼。”《坛经》曰：“内调心性，外敬他人，是自皈依也。”二程曰：“人道以敬为本。”朱子曰：“敬是圣门第一义。”王夫之则径称：“敬，礼之神也。”当然爱不可或缺，因为爱是天性。无爱则无敬，无敬则无所谓爱，“爱而无敬，兽畜之也”。所以爱和敬实际也是一种因缘。依佛家言爱即因，敬即缘，相辅相成。有真因才有正果，有爱无敬，不成正果。

故孔子说：“弗爱不亲，弗敬不正。”由爱而敬，或曰由爱提升到敬，才谓之“中”，才合适，才到位，才符合礼的规范，也才能最终实施好三大行为，处理好三大关系。敬有二义：一是忠，即孔子所谓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；二是恕，即孔子所谓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人类由正面，主动、积极地处理三大关系即忠，由侧面，被动、消极地处理三大关系即恕。人类之所以为万物之灵，就是因为人类有张有弛，有进有止，有作有息，可以动静相得，刚柔互济。人类既需要主动、积极，也需要被动、消极。而当今人类所忽视的恰恰是后者，这就是所谓物化，准确地说动物化的最主要表现。

总之，中国文化或国学归根到底是三个字：道、礼、和。这三字彼此关联，相辅相成，互为因果。道是因，礼是缘，和则是果。

道，有天道、地道、人道等。中国文化所重者“非天之道，非地之道，人之所以道也”（《庄子》）。由此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质：重人道，人本。

《礼记》说：“人道，政为大。”日前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特别引用了孔子所说“政者，正也”。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，直接关系到执政者的人文素养及其执政效果。然而何以正？答案只有上揭四字：“弗敬不正”。所谓敬，无非有三：“尊天”（墨子语，即董仲舒所谓“崇本”），互敬（人与人，国与国，民族与民族），自重。三者是为人、为政、立国和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正道。对上天大自然，对他人，对人民群众，对自己个体生命不敬，就是人品不正，民风不正，党风不正等等，一句话，就是不正道。结果只能是自然生态恶化；只能是失信于人，激化社会及民族矛盾；只能是身心不和，生命失常。只有尊天、互敬、自重才能提升境界，提高修养，进而改良执政效果，政通人和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永保中华文明之道通达和长远。

《中庸》曰：“从容中道，圣人也。”从，信从、服从，即忠；容，宽容、理解，即恕。善者从，不善者容。忠恕是人生修养的极致，只有忠恕，才能达到生命的理想境界，社会关系、天人关系才能实现理想状态。对天，对人，对自身个体生命有忠有恕，就可以实现三大和谐，即天人和谐、社会和谐和身心和谐。费孝通先生生前最后发表的“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”的“十六字令”，体现出的正是中华民族的大胸怀、大境界和大智慧、大教养。

中华春秋

王景文的镇定

□ 王兆贵

王彧，字景文，南朝刘宋重臣，琅琊临沂人。沈约所撰《宋书》评价他“美风姿，好言理，少与陈郡谢庄齐名”。就是说，王彧是个颜值颇高的美男子，好言理道，年轻时与文学大腕谢庄名望相等。宋文帝在位时，王彧官至尚书右仆射。文帝非常敬重他，以至爱屋及乌，对王彧的名字也有好感，为儿子取名刘彧，并娶王彧之妹王贞风为儿媳。明帝刘彧即位后，王彧为避其讳，只好以字相称。

人在穷途时巴望富贵，但当富贵临门时，却又担心官高莅祸。随着家门愈益显赫，眼见得那些功高之臣被诛，王景文的内心也愈益恐惧。所以当明帝再次给他加官封侯时，他不是“固辞”就是“固让”，甚至“不愿还朝”。可明帝又坚决不允，并下诏开导他说，你乃品性高洁的宗室中人，才能与声望又不输于他人，你不干谁干？高处有高处之险，低处有低处之患，与其刻意避祸，不如顺其自然。“人居贵要，但问心若为耳”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王景文“不得已乃受拜”。

俗话说，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”。明帝已患重病，担心太子稚弱，日后继位不顺，此前就把弟弟们给除掉了。让他放心不下的还有两人，王景文就是其一。明帝思虑，一旦自己不在了，皇后势必临朝，景文自然成为宰相。身为国舅的王景文，门族强盛，难保晚年仍能纯厚笃实。泰豫元年（公元472年）春，明帝病势加重，就派使者给王景文送去毒酒，带话给王景文说，朕不是说你有罪，然而我不能一个人独死，请你先走一步。并在诏书中申明，看在朕与你交情的份上，想要保全你一家，所以才做出这样的安排。

诏书送达那天晚上，王景文正与客人对弈。他看完诏书后，原样封好放到棋盘下，神色怡然不变，继续与客人下棋，待这局棋终了，把棋子收拾到奁内后，才缓缓对客人说，皇上赐我一死。说着，拿诏书展示给客人看，并研墨手书谢表。然后端起毒酒，边斟边对客人说，此酒不可相劝，说罢独自仰而饮之。

大限临头，王景文仍能从容下完最后一盘棋，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淡定，引无数后人敬佩不已，赞叹不已。更让人感慨的是，像王景文这样的人物，为何也难逃枉死之咎呢？

说到底，这与封建帝王的统御策略紧密相关。众所周知，封建帝王都是世袭君主制，他们打下江山后，国家便被其据为私有，不仅终身为王，而且世代相传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家天下。骆宾王为徐敬业所作《讨武曌檄》中，那句“试看今日之域中，竟是谁家之天下”，无非是说，天下不是武周的，应该归还李唐。武周也好，李唐也好，都是一姓独占的天下。既然江山是帝王的私产，他们在经营国家权力的过程中，特别是在用人上，就要千方百计地权衡对帝统的存续是否有利。当下用你，是因为你能保家卫国；用过杀你，是因为你有可能使家天下易主。即使你不会让家天下改姓，却会另择帝统，安置傀儡，照样在剪除之列。

总之，家天下从根子上就与公天下、公权力绝缘，是一个私利性极强的权力机构。看清了这一实质，我们就会明白，王景文为何在劫难逃了。为了能让自己选定的直系血亲皇子继承大统，父母兄弟都在清算之列，国舅等外戚又岂在话下？其实，王景文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了，否则，他也不会那么镇定。

护侨先驱张之洞

□ 任九光

近代以来，广东等省份的出洋华人越来越多。华人在海外工作低贱，时常受到歧视、敲诈、抢劫、绑架、暗杀，处境悲惨。1884年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后，强力维护华侨权益，推动侨民巡查，对海外护侨作出了重要探索。

1885年，美国爆发排华浪潮，多地发生白人抢掠、焚烧华人商铺、杀害华人的恶性案件，其中怀俄明州的石泉惨案最为惊人，华工28人被杀、15人受重伤。广东群情激愤，酝酿排外情绪。张之洞义愤填膺，电告驻美钦差大臣向美国施压，“美须迅速允缉匪赔资，不准勒辞华工”，“务宜财、命两究”。对于民间义愤，张之洞积极引导，表明朝廷正催促美国处理。如果中国爆发排外事件，则可能激化矛盾，反而让在美华人陷入更大危险之中。通过广州爱育堂和香港东华医院，张之洞实时通报美国处理案件进展，引导民间情绪，并令地方文武官员高度关注揭帖，防止被人煽动。

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到广州，张之洞指责田贝，“粤待美商如此优厚，美国何以如此虐待华民”，声明美国如能认真保护华侨，则广州“力任保护美商”。如美国不能认真履行保护华侨责任，则民间反美情绪将无法控制，在华美人安全值得担忧，言语颇有威胁之意。同时张之洞还从美国国际形象角度晓之以理，指出如美国不能保护华侨，对美国商务利益和国际形象大有损害。田贝深感惭愧，接连致电本国，要求迅速查办石泉惨案，并切实维护华人利益。

《香港日报》在报道中，描述为张之洞将“报复”美国。新闻发布后，美国国内压力骤增，缉捕凶手明显加速，美国警察抓捕逃犯中击毙1名，抓获7名，审讯进程也明显加快。英、德、法等国领事担心受牵连，同样高度紧张，纷纷向美施压，并拜托张之洞维持广州局面。然而清廷得知后大惊，传旨“若该督果有报复之语……必致枝节横生，难于收拾”，要求张之洞上奏回复。张之洞以香港媒体转述英国电文，“报复”系“华洋文字屡翻易误”导致，并上奏美国华商167家联合投递的诉求，列举华侨在美国被虐待杀害的典型案件5起，以及更普遍的在美华侨“十苦”“七难”“六种歧视”，要求朝廷对美施压，“能紧一分则必有一分之益”，“缉匪、赔偿、善后三者缺一不可”，“请美国总统特颁明文惋惜，不得以酌偿十余万、监禁七八人含糊结案”。清廷软弱，张之洞的强硬并不能改变大局，但却使美国切实感受到排华的压力。

并非仅在美国侨民众多，东南亚、澳大利亚各地侨民数量更多，处境同样堪忧。然而当时清政府并不了解侨民在海外的分布。为长期保护侨民权益，张之洞上奏指出，侨民出洋务工，每年邮寄回国白银一千多万两，贡献巨大，建议派副将王荣和、候选知府余璘赴南洋巡视，摸清华侨情况，以便增设领馆长期护侨。

在张之洞坚持下，清廷批准。1886年8月，王荣和、余璘从广东出发，历时一年，海程5万余里，巡查菲律宾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缅甸、印尼、澳大利亚等主要城市20余个。各地均为殖民地，属国不同，但华侨总数超百万，总体境况悲惨。得知祖国官员前来，华侨欢呼雀跃，争相倾诉所受虐待。菲律宾侨民境遇最惨，常遭杀害、抢烧，西班牙殖民政府官员甚至助纣为虐，借机敲诈。印尼为荷兰殖民地，荷兰官员对华人横暴，苛捐杂税繁多，华商深受其苦，甚至有种植园主雇佣华工，以赌博诱使华工负债，永无偿尽还乡之日。同时，王、余一行还对各地经济、华商状况进行调查，发现新加坡各种实业“华人居其八，洋人仅得其二”。英属澳大利亚因华人增多，殖民政府渐趋歧视，要求华人必须缴纳10英镑才能登岸，但并未出现暴力排华事件。

王、余一行回国后，张之洞将访查情况上奏，提出从菲律宾设总领事开始，逐渐在各地增设副领事，为华侨申诉、交涉，保障华侨权益。为减少朝廷顾虑，张之洞还指明朝廷只需垫付早期开设领事馆的费用，以后费用由华侨募捐。相对于所受剥削，各地华侨愿募集领事馆日常经费，还表示可募款购置军舰，组成舰队巡弋南洋各岛，以军威护侨。一旦清朝南海有事，护侨舰队又可回援大陆，增强清军海军实力。此外，张之洞还建议在各地开设书院，教习华侨子弟，使华侨子弟“习闻圣人之教”，不忘血脉乡土。

1898年，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，护侨构想因而流产。后张之洞虽身处湖北仍心系华侨。1906年，美国旧金山发生地震，当地华侨受灾严重。张之洞得悉后，克服万难筹集白银三万两，助旧金山华侨抗灾，民族情感飞越重洋。精诚所至，往者来复。一个月后，湖南发生特大洪灾，张之洞正竭力救灾之际，不意接到驻美大使梁诚来电，“金山华侨前蒙厚赈，感激异常。今赈事完，湘灾方亟，公议拨余款美金万元，交汇丰汇，寄湘助赈”。血浓于水，侨民助赈之举屡见不鲜，但多在侨民与本乡之间。湖南地处内陆，并非侨乡，此次得到侨民救助，源于张之洞在湖北救助旧金山华侨。华侨被其所感，再回馈于湖南灾民。这次不常见的侨民助赈，成为国弱民穷之际，全球华人血浓于水、联手互助的生动体现。

史 镜

中华“和”文化一印一书法系列作品



作者：李铁



时和世泰

作者：阿朗一笔